

China: 2000 B.C.

何以中国

许宏 著

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014041697

K296.1
07

何以中国

许宏 著

——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航

C1731136

K296.1
07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何以中国：公元前 2000 年的中原图景 / 许宏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3（2014.6 重印）

（解读早期中国）

ISBN 978-7-108-04615-4

I. ①何… II. ①许… III. 中原—文化史—古代 IV. ① K29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2687 号

责任编辑 曹明明

装帧设计 崔建华

责任印制 徐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0

字 数 73 千字 图 137 幅

印 数 6,001—9,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何以中国”，本来是拙著《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 2009 年出版）最后一节的标题。它以设问的形式给了这本小书一个开放式的收束：

深入发掘“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环境与文化底蘊，无疑会更全面地澄清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轨迹。对中国历史的长程观察有助于了解最早的“中国”何以诞生。

“何以中国”，本来是对原因的追问，按说回答也应是思辨性的、哲理性的讨论，但这本小书基本上是在叙述一个过程，讲一个故事——最早的“中国”诞生的故事。显然，仅仅叙述过程，无法圆满回答“何以中国”的追问，但对过程的叙述或许比论理更能逼近答案。这本小书所做的就是这种“逼近”的尝试。

如果说《最早的中国》写的是二里头王都这一个“点”，那么《何以中国》则试图讲述二里头这个最早“中国”的由来。故可以认为，它是《最早的中国》的姊妹篇。

自“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 1926 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1928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河南安阳殷墟以来，中国考古学参与古史建构的历史已近百年。通观上个世纪学术界对中国早期文明史的探索历程，由于丰富的文献材料及由此产生的史学传统，这一

探索理所当然地对具体国族、王朝的确认为中心。“证经补史”情结与研究取向，基本上贯穿了学术史的始终^[1]。

在超脱了“证经补史”的理念和话语系统之后，古史建构仍被考古学者引为己任，这里的“史”开始被看作囊括整个社会文化发展进程的大历史。作为兄弟学科的文獻史学和考古学，则更多地可以看作建构这一大的历史框架的途径和手段。解读文字诞生前后“文献不足征”时代的无字地书，进而构建出东亚大陆早期文明史的框架，考古学的作用无可替代，已是不争的事实。考古人参与写史势所必然，但话语系统的转换却并非易事。本书就是这一路向上的一个尝试，试图夹叙夹议地勾画出那个时代的轮廓。

只能勾画一个轮廓，这主要是由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的。那就是，其以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宏观考察见长，而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则不是它的强项^[2]。受这些特性的影响，考古学角度的叙述与文獻史学对历史时期的叙述相比肯定是粗线条的。由此，可以理解的是，公元前2000年这一时间点，上下浮动数十乃至上百年都是可能的。这个绝对年代只是一个约数，考古学观察到的与这个年代相关的现象只是考古学和年代学目前的认识。以耶稣诞辰为计数起点的这个时间整数，本不具有太多的历史意义。在本书中，它只是我们探究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一个切入点而已。

话虽如此，它又是一个颇具兴味的切入点。

按古典文献的说法，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是破坏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袭“家天下”的开端。一般认为，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21世纪，“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估定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3]，也有学者推算夏王朝始年不早于公元前2000年。总之，在以

[1] 许宏：《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2] 同注[1]。

[3]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传世文献为本位的夏王朝始年的推定上，公元前 2000 年是一个便于记忆的年数。

但文献中的这些记述，却不易与具体的考古学现象相对应。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无法在缺乏当时文字材料的情况下，确证尧、舜、禹乃至夏王朝的真实存在，确认哪类考古学遗存属于这些国族或王朝。狭义的王统的话语系统和视角，也不足以涵盖勾勒出这段历史的波澜壮阔。在考古学上，那时仍处于“龙山时代”^[1]。在公元前 2000 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即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依考古学的观察，这段历史还有重新叙述的必要。

但纷乱中又孕育着新的动向。大体在公元前 2000 年前后，大河以东的晋南地区，辉煌一时的陶寺文化由盛转衰；几乎与此同时，大河之南的嵩山一带，在“逐鹿中原”的躁动中逐渐显现出区域整合的迹象，新砦集团开始“崭露头角”。显然，它的崛起，为随后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飞跃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地缘政治上，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州—洛阳地区成为中原王朝文明的发祥地。

鉴于此，公元前 2000 年，是中原文明史乃至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 一般认为相当于公元前 3000 ~ 前 2000 年左右。严文明：《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文物》1981 年第 6 期。严文明：《龙山时代城址的初步研究》，《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 年。根据最新的考古学和年代学研究成果，这一时代的下限或可延至公元前 1800 年左右，与二里头文化相衔接。

目 录

解题 / 1

一 陶寺的兴衰

陶寺“革命”了? / 2

都城与阴宅的排场 / 4

龙盘、鼉鼓和特磬 / 8

“革命”导致失忆? / 11

“拿来主义”的硕果 / 13

大邑小国 / 16

小铜器的大问题 / 19

是字吗? 什么字? / 22

寻“夏墟”找到陶寺 / 25

禹都乎? 尧都乎? / 27

衰亡的谜团与意义 / 30

二 嵩山的动向

- “地理王国”出中原 / 34
- 两大集团 / 37
- 林立的聚落群 / 40
- 扑朔迷离话城址 / 42
- 城邑分布有玄机 / 44
- 危险来自邻人? / 46
- 近看大邑王城岗 / 48
- “王城”是怎样造出的 / 51
- 大洪水, 传说还是史实 / 53
- 大禹在哪儿治水? / 56
- “王城”下游有大邑 / 58
- 大邑瓦店的气派 / 59
- 方正城池的由来 / 61
- “贵族社区”平粮台 / 65
- 不可小瞧古城寨 / 67
- 暴力: 现象与动因 / 70

三 新砦的发轫

- 新砦的分量 / 74

- 众说纷纭话新砦 / 76
困惑与收获 / 78
从围垣到环壕 / 80
铜礼器的讯息 / 83
古书中“挖”出铜鬲 / 86
龙形象，权贵的秘符？ / 89
墨玉璋的来龙去脉 / 92
那年月，有国家吗？ / 94
逐鹿何以在中原 / 96

四 大邑二里头

- 山北的政治图景 / 102
二里头人从何而来？ / 104
此洛河非彼洛河 / 105
一水冲三都 / 107
“半岛”上的新居民 / 110
都邑大建设 / 112
走向全盛 / 117
持续辉煌与都邑终结 / 120
不堪重负的陶器 / 123

难哉，一刀断夏商 / 124

五 中原与中国

文化大扩张 / 130

二里头国家的“疆域” / 132

“畿外”的殖民据点？ / 135

长江边的“飞地” / 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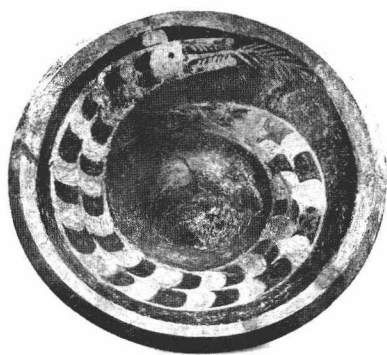
铜与盐，扩张的动因？ / 140

国家群与“国上之国” / 142

软实力催生“中国”世界 / 145

余论 / 149

一
陶寺的兴衰



陶寺“革命”了？

对于陶寺都邑的贵族来说，公元前 2000 年前后^[1]的这个“千禧年”带来的可不是什么好运，而是临头的大祸：大中地区首屈一指的陶寺都邑，居然泥腿子造反，发生了“暴力革命”！

“革命”一词，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本来指朝代更替，如“汤武革命”（《易》）等。这里则是取其新意，也即社会政治变革，更进一步说，借用的是经典作家“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的概念。

何以排除了外来族群的攻掠，可以推断这场“革命”是陶寺社会底层对上层的暴力行动呢？数千年后的考古学家，面对这样的场面也不寒而栗：

原来的宫殿区，这时已被从事石器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业者所占据。

一条倾倒石器、骨器废料的大沟里，三十多个人头骨杂乱重叠，以青年男性为多。头骨多被砍切，有的只留面部而形似面具，有的头骨下还连着好几段颈椎骨。散乱的人骨有四五十个个体，与兽骨混杂在一起。

大沟的底部一具三十多岁的女性虽保有全尸，但颈部扭折，嘴大张呈惊恐状，两腿叉开，阴部竟被插入一根牛角。

壕沟里堆积着大量建筑垃圾，戳印精美图案或绘制蓝彩的白灰墙皮等，暗示这一带曾存在过颇为讲究的建筑。联系到曾高耸于地面的夯土城墙到这时已经废弃，多处被陶寺晚期的遗存所叠压或打破，有

[1] 存在了大约四百年的陶寺文化，被分为早期（公元前 2300～前 2100 年）、中期（公元前 2100～前 2000 年）、晚期（公元前 2000～前 1900 年）三个阶段。公元前 2000 年左右，正值陶寺文化的中、晚期之交（何弩：《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古代文明》第 3 卷，文物出版社，2004 年）。



被砍切下的人头骨



阴部被插入牛角的
受害女性

理由推测这里曾发生过大规模人为毁坏建筑的“群众运动”^[1]。

包括“王墓”在内的贵族大中型墓，往往都有这个时期的“扰坑”直捣墓坑中央的棺室，扰坑内还有随意抛弃的人头骨、碎骨和玉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 2002 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 年第 3 期。

器等随葬品。这与安阳殷墟西北冈王陵的遭遇颇为类似，而并不像后世的盗坑。两三座贵族墓扰坑中出土的石磬残片，居然能拼合为一件完整器，说明这些墓同时被掘又一并回填，毁墓行为属于“大兵团作战”。掘墓者似乎只为出气而毁墓虐尸，并不全力搜求宝物，所以给考古学家留下的宝贝还有不少^[1]。当然，顺手牵羊的事也是有的。一些小墓里就偶尔随葬有与死者身份并不相称的个把高级用品，让人联想到这可能就是“革命者”的战利品。

种种迹象表明，这似乎是一种明火执仗的报复行为。而考古学家从日用品的风格分析，延绵数百年的“陶寺文化”又大体是连续发展的，也就是说，报复者与生前显赫的被报复者，应当属于同一群团。显然，作威作福的陶寺贵族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场来自群团内部的血雨腥风，摧毁了它的贵族秩序和精英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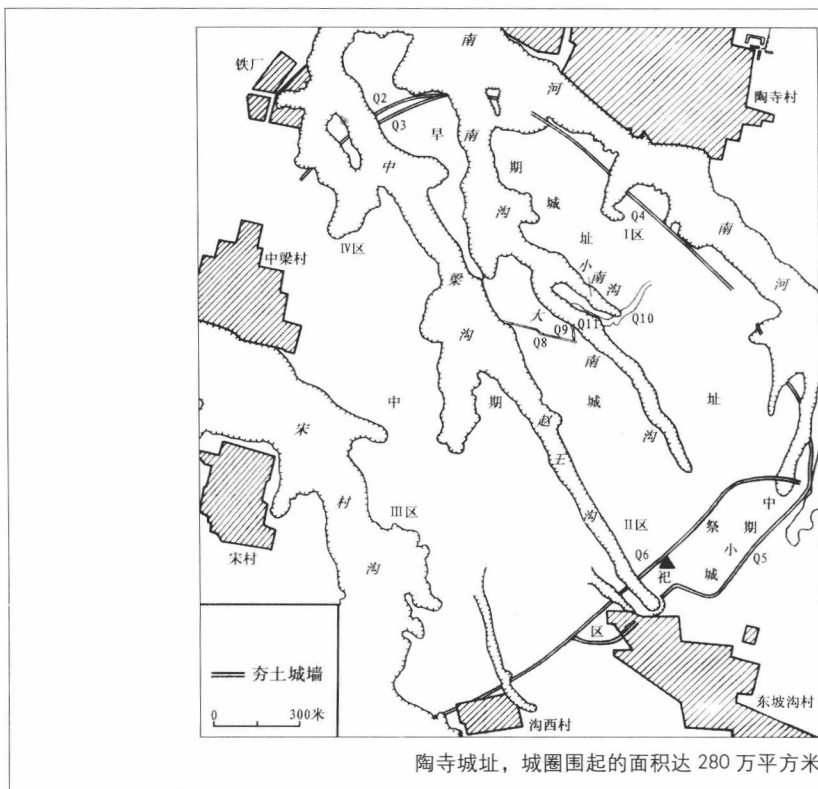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大概就是从这类历史事件中被我们的先人提炼出来的，而陶寺“革命”应当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实例。

都城与阴宅的排场

在此之前，陶寺都邑已经历了二三百年的辉煌。其所在的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段，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晚期，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这也正是陶寺古国“大出风头”的时代。其都城规模巨大，内涵富于“王气”而傲视群雄，使同时代的众多古国相形见绌。

这个时代，在黄河和长江流域，最显著的人文景观应当就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城圈了。散布于黄河两岸的一座座土城，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适应黄土和黄河的产物，是这一地区迈向文明时代处理人地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物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杰作。直立性和吸湿性强的黄土，使得版筑（在夹板中填入泥土夯实的建筑方法）成为可能。高大的夯土城墙和筑于高台上的宫室建筑等，昭示着社会的复杂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明纪念碑。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土木工程建筑方法，在现在的黄河流域农村还时有所见。

陶寺都邑就环绕着这样一周夯土城墙，城墙圈围起的面积达 280 万平方米^[1]，城墙周长约 7 公里。有人测算过，人走路的速度一般是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陶寺城址 2002 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 年第 3 期。

每小时4~7公里，那么一队守城士兵快速绕陶寺城巡查一周，就需要一小时的时间。城墙宽一般在8米左右，高可阻人。绵延达7公里的城墙是多少人，怎么样夯筑起来的？城里又会容纳多少人？巨大的用工量显示的社会动员力，庞大的城区中生活的人口数，都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隔河相望的河南，此后要在中国文明史上大放异彩，这时也是城址林立，但与陶寺的气派相比则要小巫见大巫了。最大的登封王城岗城址30多万平方米，禹州瓦店遗址有两处围以环壕的区域，各约40多万和50多万平方米。其他城址的面积则大多仅有10余万甚至数万平方米。与中原相映生辉的山东，此时最大的城址面积也只有30多万平方米。

这就是陶寺，卓尔不群。

我们再把视线从地面转到地下，看看陶寺社会上层“阴宅”的排场。



极尽考究的陶寺大墓，墓室与壁龛内遍布各类随葬品

近年发掘的一座陶寺文化大墓（编号 M22），堪称同时期墓葬中的“巨无霸”。这座墓也毫无例外地被扰乱了一通，但还是出土了 100 多件套的随葬品。为了安葬这位贵族，长宽分别在 5 米和 3 米以上的长方形墓穴穿地而下，残深仍有 7 米多。陡直的墓壁上还装饰着五周平行的手抹草拌泥宽带，也许就是对居室装修风格模仿。古代中国人“事死如事生”，墓葬是生前生活环境的缩影。

在可以想见的排场的安葬仪式上，人们把一具船形木棺安放在深深的墓室底部正中。木棺由一根整木挖凿而成，通体红彩鲜艳夺目，上覆布质棺罩。由于毁墓行为，墓主人的尸骨和贴身随葬品都已被扰乱。

一副完整的公猪下颌，被高高地放置在墓主人头端的墓壁中央，公猪的头似乎在威严地俯视着整个墓室。以其为中轴，这面墓壁下方两侧各倒置着 3 件彩漆柄的玉石钺和戚（钺的一种，两侧边缘有扉齿），兵器的陈设显现出仪仗的威风。棺木的左侧与墓壁间排列着 4 柄青石大厨刀和 7 块木案板，厨刀下的骨骼和朽灰表明下葬的当时案板上放着鲜猪肉。墓主人脚端一侧摆放着 20 斤一劈两半的猪肉，应用 10 头猪来殉葬。墓室周围还放有多槁木盒、带漆木架的彩绘陶器、漆器、装在红色箠（盛弓箭的袋）内的骨箭头和木弓等。墓的四壁底部掏有 11 个壁龛，里面放置精美的玉器、漆器和彩绘陶器等随葬品和猪肉。在墓葬回填、葬仪接近尾声时，一名青年男子作为牺牲被腰斩，尸体埋于墓室的填土中^[1]。

陶寺上层人物的排场，由此可见一斑。掘墓人怀有刻骨仇恨的种籽，或许就埋藏在这类大墓中。

从毁墓者总是可以准确地直捣墓室看，这些贵族墓在填平墓穴后，地面上一定设有某种标志，至少在他们掘墓时标志还存在。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后期墓葬》，《考古》2003 年第 9 期。